

侗族通婚圈的历史变迁 ——以贵州榕江车寨为例

杨筑慧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车寨通婚圈,呈现出内卷化的结构性态势,“同类婚”占绝大多数,其通婚范围既不与“市场圈”同构,亦不与“祭祀圈”完全重合,表现出与自给自足经济密切勾连的特点,如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之后,出于理性生存的需要,原有的通婚对象的选择范围被打破。

关键词 侗族; 通婚对象; 选择范围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040-09

通婚圈是指择偶的范围,蕴含着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是指某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如杜赞奇对20世纪初河北良乡吴店村和栾城寺北柴村通婚圈的研究中指出,“从村庄距市场远近的资料来看,新娘所在村庄多散布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方圆10里以内,……”又说“出嫁闺女的村庄坐落于婚娶的村庄‘联姻范围’之内,这一范围可能独立于集市圈之外,其辐射半径可能以一定时间内步行可到的距离为准,亦可以原有联姻范围为准”。^[1]自然的地理空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理距离,而这个距离往往又是以社会空间为基准的。婚姻自从在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从来不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它关联着与当事者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故而,社会空间所涉及的面较广,如种族、民族、阶级、血缘、文化、价值观念、经济等等,由此我们也可窥视到一个社会的诸多事象。如一些学者所言“通婚圈是伴随着两性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圈子,通婚圈形成的社会基础源于婚姻是超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婚姻的本质是文化的、社会性的制度,婚姻的缔结不是生理本能的驱使,而

‘文化引诱的结果’,直接受到各种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和制约。”^[2]历史上,在许多相对封闭的民族传统社会里,其通婚圈存在某种结构关系,人们的婚姻缔结遵循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律,并对该社会秩序的运转、文化习俗的延传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通婚圈是我们理解一个民间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任何社会结构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基于特定的理性需要,人的能动性会以其特有方式打破常规,使结构在动态中重新寻找新的平衡状态,通婚圈亦如此。从此意义上来说,对村落社会的深入研究,其通婚圈是绕不开的关注点,从中我们既可了解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可以在动态中认识其社会变迁的轨迹或样貌。本文以贵州省一个侗族村寨为例,通过对其通婚圈历时性的探讨,以认识在社会转型期,该村落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与国家、地方的互动关系。

一、村落概貌

侗族是我国南方地区历史悠久的稻作民族之

(收稿日期) 2013-09-18

(作者简介) 杨筑慧(1966-),女(侗族),贵州榕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民族生态学视野下的侗族稻作文化研究”成果。

一，共有人口 2879974 人（2010 年统计），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地区，其中贵州 1431928 人，湖南 854960 人，广西 305565 人，湖北省约有侗族 52121 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侗族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逐年增加，至“六普”时，在东部地区超过万人的省份主要有：浙江 88106 人，广东 83574 人，福建 15608 人，江苏 12280 人。在广东的深圳、东莞以及浙江的金华，侗族人口亦超过万人，上海也有侗族 7787 人。东部地区侗族人口的增加，基本上属于机械性人口增加，与本文所讨论的通婚圈扩大有一定的关系。

车寨为坝子型村落，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县城古州的东北面，车江大坝南部，南与县城隔平永河，有公路大桥与村寨连接，寨子西面为寨蒿河，其东为马鞍山。车寨所处之地为“三宝”辖域，三宝是清代以来人们对车江的称谓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侗寨”，由 9 个自然村寨组成，从南往北，依次分别是车寨、恩荣堡、章鲁、寨头、英堂、麦寨、六佰塘、月寨、口寨。9 个自然村寨首尾相接，绵延 10 余里。随着人口的增加，除车寨与其他几个寨子间尚有一定的间隔距离外，其他 8 个寨子基本上连接在一起。习惯上，人们又将车寨分为三村，即车江一村、二村、三村，三村还包括二地角、妹寨和恩荣堡。一村有 7 个小队，二村有 5 个小队，三村有 4 个小队。车寨人口以侗族为主体，98% 以上为侗族。从清乾隆《古州厅志》和 2009 年榕江户籍统计来看，^① 车寨人口数量自古以来一直居车江各寨之首，为名符其实的大寨，加之与县城相距较近，历史上文化人较多，田地广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故车寨在当地侗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外寨姑娘也以嫁到车寨为荣。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车寨侗族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较为明显，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经济收入也源自农业。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油菜、棉花、西瓜、蔬菜等，大多数人家饲养猪、牛、鸡、鸭等畜禽。纺纱织布是妇女们在农闲或其他闲暇时间最为经常的副业之一，民国初

年，车江侗族妇女纺织出来的侗布经久耐用，不易褪色，曾在重庆全国手工业展览会上荣获奖状和银质奖牌。^{[3] (P. 275)} 其时村中也有极少数人做点小本生意，如开小卖部等。总体上来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当地村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写照。但这种生活方式在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外出打工、运输、做零工、出租房屋、倒卖水果蔬菜、开停车场等等，各种“活路”成为村人的常态，人们的生活也不再如往昔那般悠闲自在。与此相适应，车寨的通婚圈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传统农耕相宜的择偶标准为适应适宜于更开放和多元的生计方式而发生了变化。

二、古歌中的通婚圈

由于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历史上对于侗族的通婚圈没有明确的记载。古歌《夏谷又》曾唱道侗族古代有“同姓同寨不婚”的习俗，民间流传说“30 天路程是姑娘嫁出去的去处，40 天路程是罗汉（小伙子）娶妻的地方”。^{[4] (P. 106)} 远娶远嫁，给青年男女的婚姻带来许多不便。流传于车江一带的《祖公上河 破姓开亲》（嘎斗莎）古歌也唱道：

“说到当初嫁娶，
同姓不通婚，
异姓才相连。
三十天路还说近，
四十天路不嫌远。
姑娘新裙成碎片，
腌鱼生蛆丢路边。
糯饭已经成酒糟，
拿到嘴边难下咽。
索彦姑娘半路死，
索益姑娘半路亡。
尸骨找不到，
坟墓无法安。
嫁出远门去，
遇难第一桩。”^{[5] (P. 75—76)}

古歌里还叙述了一个名叫美道的姑娘，嫁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她回娘家探亲时，在途中被蛇

^① 乾隆《古州厅志·田赋志》载：时车寨共有 370 户，926 丁，章鲁有 178 户，568 丁，口寨有 160 户，538 丁，六佰塘有 40 户，200 丁，月寨和脉寨共有 153 户，583 丁，寨头有 212 户，831 丁。又据 2009 年 10 月统计，车寨三个村共有 948 户（其中一村 435 户，2061 人；二村 268 户，1296 人；三村 245 户，1244 人），章鲁 296 户，寨头 262 户，脉寨和六佰塘共有 414 户，月寨与岑转有 331 户，口寨等 461 户（2009 年数据为榕树江县古州镇办公室提供）。

妖强掳为妻，后多亏丈夫英郎和乡亲们营救才幸免于难。这种习俗渐渐激起了侗族人的不满。“杉桑都是树，杉桑都是木，嫁近也一样，为何要远出”。^{[5] (P. 77-81)} 于是，清乾隆年间在贵州榕江车江的月寨（一说在黎平中潮）召开了九十九款大会，商议婚俗的改革，决定破姓开亲。从此，姑娘不用远嫁，男子不再远娶。^{[4] (P. 106)} 起款议是侗族历史上运用民间社会组织“门款”及习惯法处理款内重大问题或涉及全局性问题时的一套规约，对于清乾隆年间这次重大的婚姻制度改革，也是侗族历史上通过口耳相传方式所知道的最大一次改革，《夏谷又》也描述说“破姓开亲，兰昔破姓；兰松破整个侗乡条规。”从此以后，不必要到三十天路以外的地方去求亲。^{[3] (P. 298)} 流传于广西、贵州黎平和榕江、湖南通道等地的款词《九十九公破姓开亲》也讲道：“邀齐八十八寨，聚拢九十九公。……议定破姓开亲。除旧俗，立新约，丢苦痛，换歌声。石娶石，杨娶杨，姜良姜妹配成婚。吴嫁吴，张嫁张，隔条阳沟就成亲。”^{[6] (P. 639)}

古歌中的侗族通婚圈既涉及地理空间，也涉及社会空间，如同姓不婚、姑舅表婚，“美道是姑妈家女，英郎是舅舅家男。乡风侗俗在，表妹要嫁舅家崽。先有竹，后有笋；先有稻，后有秧。美道长大，嫁给英郎。报答外公外婆，服饰舅爷舅娘”。^{[5] (P. 77)} 说明早在清乾隆以前侗族先民就已实行氏族外婚制，且以同辈婚为主。为何形成这种远嫁远娶的通婚圈，古歌中没有提及，民间亦无相关传说或记载。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侗族先民有从广西梧州等地迁来贵州的传说，迁移过程中，由于土地紧张、人口较多，不得不分寨而居，同一家族和姓氏者同居一寨，同时为避免血亲之间的通婚所带来的子孙不昌，故渐形成了异寨异姓通婚的习俗，如古歌所唱：“公奶前面引路，儿孙随后紧跟。从此离开宜注、约注，沿河而上，背井离乡。走出胆村，越过课告，走进课根，岔过细田，出了天府，来到茶寨潭边乌柏树下。公跟奶说，奶对公讲，分崽住村，分山住人。七将在地，五将上天。姓吴的住高山，姓杨的住平地，姓石的在河旁，姓梁的在竹林干溪。村村住满人，寨寨都兴盛。”^{[5] (P. 75)}

这一通婚圈的形成既利于亲属关系的扩大，也避免了因土地紧张而带来的纠纷，可以说，是时人基于族群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的通婚圈

同姓同寨不婚的习俗自清乾隆年间被废除后，侗族的通婚圈于是在地理空间上经历了由远而近的变化。此后，同寨优先婚成为车寨人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民间俗语称“好米不出缸，好女不出寨”，意思是说，“根骨”^①好、能干、长相出众、品行端正的姑娘，是不嫁到寨外的，否则会留下话柄，家人亦会受到非议。综观整个车江侗寨，传统的通婚范围大致都以当地村落为中心，大部分相距在20里之内，尤其是5~15公里之间为绝大多数，主要是相邻村落间，小部分在20~50公里以内，极少数在50公里之外。而车寨人则基本上在南北长约1公里多、东西宽约0.5公里的范围内嫁娶。生长于斯的车寨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已将这种价值观念内化于自己的行为规范中。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一些车寨人到了外地工作，也仍将寨内择偶作为首选。如1958年，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员，贵阳某些单位曾到榕江招工，时车寨前后约有10名女子也被招收，她们中后来有6位又回到了车寨，并嫁给了寨中人；即使留在贵阳的4位，也都先后找了有工作单位的寨中人。在当地人看来，条件不差的女子外嫁是自降身份的一种表现，会落下“不好姑娘”的名声。从笔者的调查中了解到，一般情况下，现50岁以上的女性是极少外嫁的。而村寨外出工作的不少男性，大都也是娶本寨女子，或将她们留在寨中生儿育女、伺奉老人；或带到工作地作家属。那时的车寨人，对外嫁外娶都心存压力，人们也常以某外来媳妇不明事理说事。这种认知在中国南方许多民族中同样存在，如排瑶传统上也实行民族内婚和地域内婚，俗话说“好女不嫁外村”，如果有人家嫁女给外民族或外村，不仅要遭到别人的议论，而且别人家的女儿也不会嫁给这户人家的儿子。^[7] 这种村寨内择偶的习俗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车寨村寨内部通婚时，还特别讲究“姑舅表婚”。

① 所谓的“根骨”正，是指祖上没有因恶行而留下话柄，血统上没有外来因素或疾病等。

在当地，一般同宗不婚，姨表兄妹也被视为同胞共母的兄弟姐妹，也不能通婚，盛行“姑舅表婚”，俗语称“树最高的是杉，人最大的是舅”。按其俗，姑家之女，只要年龄相适，必有一女嫁给舅家之子为妻，即使外嫁，也要在事前征得舅家同意，而且在结婚之时，甥女和甥女婿家要分别以上宾礼宴请舅家，表示“娘亲舅大”，否则会引起舅家不满。

总结车寨人尽可能不与外寨人通婚的缘由，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怕“根骨”不好，祸及后世，子孙不昌。在榕江三宝地区，人们还往往排斥与三种人结亲：一种叫“笨腊随”，即“蛇种”。说其人常有蛇追随踪迹，在其一生中须毒害一命，否则自衰败灭，永世不昌。又说其毒药以蛇唾晒干，施于食中，中者腹生幼蛇，久而久之，自丧其命；二种叫“笨耍棍”，即鬼魂种之奶奶，有的译为“酿鬼”。是说该种人附有“鬼魂”，无影无踪，随其所思而其魂乃袭于人。逢者肠绞肚痛，捧腹叫喊。甚至鸡禽遇之，亦可遭到其害。第三种叫“笨耍疙”，即疙种之奶奶，中者周身发痒，皮起疙瘩，坐卧不安。人称此三种人传女不传男，且长得高大美貌，知者不娶，故常外嫁他村他乡，有的则终身不嫁。^① 在一些侗族地区，民间还有这样的款词“强客进村，引外人进寨，田里无收成，山上没出宝；团寨冷淡，家业萧条；老人不喜欢，年轻心不宁；侗变不成汉，马变不成牛；做家业不富，养猪羊不长；浸米不发，种茶也不成。方方无计，事事无成。一怪天地，二怪年成，准是丢了祖宗规矩，搞烂乡村！”可见，与外村寨通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成为人们避让这类婚姻的心底警示。

二是历史记忆的影响。传说历史上车寨曾与周边的辣岑寨通婚，某时有一车寨女嫁至辣岑寨某户为媳，该户为了买田地，银钱不够，命其儿媳前往娘家借得白银一篓，但后来该户不认账。双方为此争吵，但口说无凭，又无人可证，寨人只好对天发誓，从此断绝通婚关系，若违者，只发财不发人，或只发人不发财。^[8]

三是等级观念的影响。清代李宗昉在《黔记》卷三曾记述道“洞崽苗在古州，先代以同

群类分为二，居大寨为爷头，小寨为‘洞崽’，‘洞崽’每听爷头使唤，婚姻各分寨类，若小寨私与大寨结婚，谓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则聚党类尽夺其产或伤命。”车寨自古即自为是大寨，其周边的头塘、料里、八孖等村传说也曾与车寨有通婚关系，但不知何时开始的等级观念将这种关系打破。不仅鲜有通婚之事，据说八孖历史上还属于车寨“腊万”杨姓家族，遇该家族婚丧，八孖寨人皆前来帮忙。不过此俗今已不存在，^[8]但反映了历史上这一等级观念的影响。

四是习俗与语言的差异性。笔者在调查中曾问及当地人何不与上宝或中宝的侗族通婚时，一些人认为各自习俗不太相同，如发音的差异，娶亲送礼多，结婚时女的不能入席，丧礼时娘家须请八仙等。同一民族尚有此隔阂，何言他族。

五是情感所需。侗族人重视人多势众，聚族而居，既是获得心理平衡的需要，也是一种防范风险的机制。同时，对于女性来说，最初的婚姻生活会有许多不适之处，她们需要娘家的支持，而娘家在往后的社会生活中，同样需要女儿的情感支持。另外，在车寨侗族社区还有这样的习俗，当外嫁女过世时，需其娘家人验尸后方可入棺。可见，远嫁远娶不利于强势的形成，也不利于情感交流，尤其是遇到天灾人祸之时，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如款词《头在古州尾在柳州》所说“头在古州（即今榕江），尾在柳州。古州是盖，柳州是底。肉坏了要盐，风箱漏了要鸡毛（风箱里的活塞用鸡毛做成）。亲戚离远难看望，远水救不得近火。火烧得快，水来得慢。等水来，火已过，等柳州来救我们，我们已不在世上。”^{[6] P.572} 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大多数地区侗族实行的仍是族内婚，即民族内的通婚规则。人们认为，以远寨为亲，路途遥遥，交往不便，亲属关系的优势也得不到体现；与他族通婚，文化有差异，价值观不同，容易造成家庭不和，也不利于亲属关系的扩展。民间谣谚说“外寨家有十等（一百斤禾），不如寨内五拜（五十斤禾）为佳”。

六是人口增长、家族较多，为彼此间的通婚提供了可能性。车寨以杨姓为大姓，约占总人口

^① 张民.《榕江县三宝侗族婚姻调查》，载《贵州民族调查》（之四，内部资料），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1986年8月。

的80%，其他还有30余姓，如吴、陈、王、向、张、韦、梁、李、刘、欧、潘、蒋、龙、贺、唐等。据传说，车寨侗族多来自江西吉安、广西梧州、广东梅州等地。最早定居车寨者为杨姓，但各杨姓家庭传说来此时间不一，如“腊饶”（敖格）^①杨姓大约是在明末清初迁到车寨，^[9]笔者收集到的“腊嗨”（海格）杨姓家谱记载了其十代人，最早一代大约是在1716年来到车寨。从中可看到，至迟明末车寨已有侗族先民居住。此后，其他姓氏陆续迁来。这些后迁来者，有的娶当地女成为当地侗族，有的被其他杨姓家族收纳，归于某“格”，大多变为侗族。车寨杨姓虽为大姓，但分属不同的“格”。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为不同的血亲通婚提供了可能。清乾隆年间后，车寨打破了“同姓不婚”的规约，本寨嫁娶成为人们的最佳选择，按习俗，通婚对象是一定要避开同族男女的，按寨人说法“乱婚不乱族”。由于经年累月本寨人相互嫁娶，故基本上形成了全寨人均“连络皆有亲”的局面，相互之间总能牵扯上远近不同的亲属关系，对同一人，亲属称谓在不同的场合下又有不同的表述。当然，虽然都属同寨人，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人们尽管对财富或经济地位、门第不是很重视，但“根骨”、外来者身份以及个人素质还是十分看重的，如是否勤劳、能干，秉性如何等。

七是区位优势的影响。车寨在榕江所有侗寨中，是离县城古州城最近的一个寨，仅仅一公里左右，且有公路大桥连结县城。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也是与县城“官方”密切往来的一个寨子。寨子东面是万亩良田，山上有茶树、杉林，溪水密集，灌溉系统发达；寨西为寨蒿河，河坝上过去是棉花地和菜地。坐享旱涝保收之地，人们似乎从不为温饱问题着急操心。如《祭祖歌》所唱“古州地方好，三宝坝子富。种棉成球，种谷从丰收。猪羊满圈人兴旺，村村寨寨乐悠悠。”此外，民国时期在寨东面还建有“国师”，即师范学校，寨人因之就近读书甚为便利，并出了不少文人。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车寨是榕江侗族中出文化人最多的一个寨子，寨人至今仍

以为豪。这种区位造就了当地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将除县城之外的人称为“乡下人”。而从婚姻缔结的趋势看，是一种“往上攀”的走向，下行则为人们所规避。但县城里居住的基本是汉族，文化不同同样不宜结亲。在这种情形下，寨内通婚便成了首选，这也便于在村落中社会资本的积累。

正是基于多因素的影响或考量，寨内婚成为车寨人择偶的首选。当然，优先并不等于没有寨外婚，从笔者的调查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本寨嫁出的女性主要有几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前被土匪看中、长相较差、脾气坏、精神有毛病、家庭成份不好、离异、不能生育、家庭“根骨”不好等；外娶者一般是家庭“根骨”不好、家庭条件实在太差、没有老人管、个人条件也不是很好等情形。由于同居一个寨子多年，在这样一个熟人社区里，可以说基本没有隐私可言，相互间知根知底，谁家情况如何、儿女品性如何，谁也隐瞒不了，人人是监督者（或评判者）又是被监督者（或评判者）。一些外来媳妇（多为“乡下”侗族，较少有其他民族者）为在寨中站稳脚跟，往往都显得较为能干、冲闯。据笔者对车寨中老年外来媳妇的来源地统计看，她们大多来自上宝和中宝侗寨，以及从江腊娥等侗寨，她们中有的长辈与车寨人有一定的亲属关系。

从上述可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车寨侗族的通婚圈基本局限在本村寨内部，具有内敛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使有外嫁外娶者，但非为正常情况，与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言之通婚圈与市场圈不能完全重合。^②事实上，车寨通婚圈的形成与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车寨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自给自足成为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人们使用现金并不如现在这般范围广而多，同时，城镇化在当时也未提上日程，交通更没有现在便利，优越自然环境下的农耕生计方式基本满足了人们的生存之需，这种同寨为上乘之

^① “格”有家族之意。全寨约分为8个格，即香格、金格、万格、威格、流格、敖格、宣格和海格。另外，在车寨南面和北面分别还有“白洛”和妹寨，前者大多是外地人，如苗族、汉族，一般不让他们住寨中，寨人认为让外人住寨中，寨子就不发人；后者虽为侗族，但不分格，也是后来才迁到车寨的。另外，在原寨子东面师范旧址旁的“芒恋”也是外来者，也不让他们入寨中居住。

^② 古州镇集市是榕江最大的集贸市场，周边苗、侗、水、汉等族村寨的群众均到此赶集。但车寨侗族鲜有与苗族、水族、汉族通婚的现象，与其他侗寨则如文中所述多为非正常情况下的通婚。

选的通婚圈可以说与生计方式是相宜的。但这种情况在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四、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车寨侗族通婚圈的扩大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发展的渴望不仅是国家层面重要的决策内容，也是地方发展的诉求。可以说，影响当地通婚范围扩大的推动力伴随着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地方的密切互动而伸展，外出务工、城镇化建设、高速路高铁建设以及大众传媒的普及，是影响车寨侗族通婚圈扩大最重要的因素，而其中的大量青年男女外出务工则直接导致了当地通婚圈的扩大。早在 1979 年，榕江在忠诚区试种西瓜成功，改变了“西瓜种植影响粮食产量”的说法，80 年代初即开始推广，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榕江西瓜即在中国南方地区享有盛名。作为技术指导员，章鲁、口寨一些农民开始到西双版纳指导种植西瓜，口寨一些小伙子将傣族姑娘娶到寨子，这一现象当时传遍了整个车江侗族村寨，不过，在车寨，人们对此类现象还是颇为抵触的。西瓜种植使榕江侗族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增多，但从整个车江大坝的侗族村寨来说，大规模远嫁远娶的出现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广东，榕江自古与广东有“一衣带水”的联系，历史上榕江出产的木材通过都柳江水运方式到达柳州、广州等地，然后转运到全国其他地区。而且，车寨侗族中还有来自广东梅州的记忆。这种历史的渊源关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加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增加，他们的安置成为村寨的一种压力，也成为当地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车寨许多青年男女纷纷南下广东，进入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此后，又有一些青年人到了浙江、福建等省“打工”。大量青年男女流向他乡异地，在改变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同时，其价值观念、通婚范围也因之而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在家乡的通婚圈内寻找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里谈婚论嫁，其中包括跨县、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婚在内的各种远距离通婚模式不断出现；另一方面随着许多现代因素的渗入，对于某些传统社区，与外界、他人的交流

接触不多，差异渐渐缩小，因而不同民族间通婚愈加频繁。

对于侗族青年来说，跨族通婚虽然还存在文化上的羁绊，但现实的理性需要、脱离社区环境的束缚，使许多年轻人选择了“外地人”，这种情形尤其在女性中更为突出，这与民间传统的“男娶女嫁”习俗有关。女性在婚前的状态是“不稳定”的，与传统社会的男性相比，她们可以通过选择丈夫在经济或社会地位等方面获得改善。在许多村落社会，正是女性的流动，构筑了村落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男性，守家固土的观念成为他们内心自觉不自觉的约束，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牵挂，但对于女性来说，嫁到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使她们在婚姻市场中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故而，当最初车寨有女嫁到外乡异地，虽然也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乡人的纷纷议论。但是，当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且姑娘们在他乡异地生活尚可时，人们不再视之为另类，姑娘们更无来自家乡的心理压力了。于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车寨女子外嫁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与此同时，适婚女性的大量外嫁，造成了村落婚姻拥挤的状况，男性可以选择的符合传统习俗标准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外娶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车寨，有的男子也会在打工地选择配偶，但更多的则是到榕江“乡下”的侗寨或其他民族中选择。传统的通婚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个案一：YQY，女，29 岁，车寨一村人，侗族，嫁往山东，丈夫为汉族，2008 年结婚。

“我去广东打工时在那认识我的丈夫，当时怕家里人不同意没跟家里人怎么商量就直接结婚了，过了一年才回来说结婚了。我老公家在山东，家里人都说嫁那么远去看望我很难，所以也就只有过春节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时候我才回来，如今因为我要和丈夫一起打工孩子只能交给我妈妈带，这样每年为了看孩子我回娘家的次数就多了。其实现在在很多人孩子都出去打工，她们都不想回来嫁这里，尽管家里人反对也没用，在这里只有种地，也没钱挣，能找个好地方嫁当然就嫁了。”

除了因外出务工引发的通婚圈扩大外，在车寨还有拐卖、掮客介绍、呼朋引辈等方式引发的妇女外徙。拐卖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打工地被拐卖，二是在家乡被拐卖。一些被拐卖的女子常常多年后才与家人取得联系，且已在迁入地生子女。因打工自由恋爱外迁与被拐卖外迁的女子到了迁入地，渐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同时，东西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使她们感觉到迁入地的生活水平高于自己的家乡。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呼朋引辈的女子外迁，即她们利用探亲的机会，将自己的姐妹或好友介绍到自己的生活社区。与此同时，由于迁入地高额的娶亲开支以及嫁入城市的女子越来越多，加之一些男子本身家庭、身体状况等原因，使他们在本地婚姻

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子不仅勤劳，且娶亲费用远低于本地，于是托人介绍对象的现象在一些迁入地渐渐常见。“婚姻掮客”专到一些民族地区“做媒”，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而许多外嫁妇女出嫁前既没有去过男方家，也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有的只知是某省，稍强点还知道是某县，何乡、何村则不得而知，形成了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女子外迁的另一途径，包括车寨在内。自20世纪80中期以来，车寨女子外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据笔者一项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12月底，车寨外嫁中东部省区女子数量如下表所示：

车寨姑娘外嫁人数统计表

省区	广东	广西	安徽	湖南	四川	江西	福建	浙江	湖北	山东	河北	河南	江苏	上海	总计
车寨一村	13	5	21	9	12	2	3	4	3	1	2	0	1	1	76
车寨二村	16	4	4	4	0	0	1	3	0	1	1	1	1	2	38
车寨三村	4	7	4	1	2	0	1	1	0	1		0	0	0	21

大约20年间，车寨三个村约有135名女子嫁到中东部省区，这里还不包括嫁到本省其他地区的，另有个别甚至嫁到了法国、新加坡、美国。

与女子外嫁相对应，男子外娶也成为普遍现象。如下表：

车寨婚入基本情况（截止2009年底）

村落	车寨一村	车寨二村	车寨三村
人数	91	12	19

外来媳妇主要来自本地“乡下”、邻县（从江、黎平等），省内的贵阳、凯里、遵义等地，以及省外的四川、湖南等。这些婚入者并不一定生活在车寨或榕江，多数仍然与丈夫在外地打工谋生。

个案二：WGM，女，66岁，家有5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媳都是外地媳妇。

“我有5个儿子，其中大儿媳、三儿媳和五儿媳都来自同一乡镇——车江乡，但是不同村落。大儿媳和五儿媳分别是车寨一村和脉寨七村嫁到我们车

寨二村来，而五儿子是姑舅婚，因为五儿媳是儿子他堂姑的女儿，另外二儿媳是我们车寨二村本村人。而二儿媳和四儿媳都是外地媳妇，二儿媳是贵州遵义的汉族，四儿媳是贵州凯里人，都是儿子在外打工后自由恋爱认识结婚的，平时二儿子家和四儿子家都不在这儿，都在外面打工生活，春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时就回来。”

在车寨的历史上，虽然也有不少与外寨通婚的案例，但基本局限于同一民族内部的通婚。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通婚圈，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远远超出了车寨范围，扩展到县域其他地方，甚至州外、省区外乃至国外，而且从社会空间来说，也已完全打破传统的规约，仅民族成份而言亦越来越多样化。

通婚范围的扩大，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了许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亲属关系逐渐弱化。世代被囿于狭小生活空间的车寨人，在传统的通婚圈里获得了来自亲属多方面的支持，走出山村之后，亲属关系难以发挥其

应有的支持作用，在此情形下，他们逐渐转向学缘、业缘关系，以期从中获得支持。第二、民族传统习俗日益式微。传统侗族社区青年人的恋爱以“行歌坐月”的方式进行，即在允许的通婚圈范围内，青年男子成群结队到某一女子聚集的家中谈天说地、弹唱对歌，并在其中寻觅意中人。在此过程中，民族习俗得到传承，同时，姑娘们在与男子聊天中往往还做手工，纺纱织布，民间技艺也在此间得到延续。但这一切随着青年男女大量外出和在异地他乡寻找配偶而日渐消失。目前，在车寨，那种走村串寨、弹唱对歌的情形已十分少见，也鲜见女孩子们纺纱织布，甚至在婚礼仪式上都找不到可对歌的青年人，只好让中老年人甚至从外面请人来对歌，以增加婚礼的气氛。第三、民族语言的传承受到了一定影响。通婚圈延伸至外地，许多外来媳妇或女婿与车寨人交际沟通的语言变成汉语，孩子们在家庭中受到父母语言影响，也使用汉语。与此同时，在车寨城镇化的过程中，许多外地人租住在车寨，他们同样使用汉语，加上电视等传播媒体的影响，汉语在当地已成为最为通用的日常语言。第四、留守儿童增多。在车寨，由于外出打工者较多，许多年轻人因在外地不便或因成本较高而难以抚养孩子，于是，无论是外嫁的还外娶的，将孩子托付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些孩子于是成了“留守儿童”。此外，外地媳妇或女婿对当地的民俗文化不了解，大多数人也不居住在寨内，外嫁到异地的侗族女孩子在流入地也重新社会化，难以承担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可以说，通婚范围的扩大，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它使族群文化因之也发生了变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车寨通婚圈由大到小再扩大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当地侗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变化以及与外界社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车寨通婚圈，呈现出内卷化的结构性态势，“同族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其通婚范围既不与“市场圈”同构，亦不与“祭祀圈”完全重合，表现出与自给自足

经济密切勾连的特点，如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在一些学者看来，“通婚关系是村落之间建立稳定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通婚关系，形成一种超村落的联网，这一联网制度化以后可以转变为超村落的地域，这个基于通婚关系所建立的地方共同体就是‘通婚圈’。在通婚圈内，村落与村落之间形成较稳定互通有无的关系，通婚圈是村落之间交往建立联系最重要的社会网络”。^[2]可对于车寨来说，通婚圈并不是作为联系村落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寨中亲戚多才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显然，这种内卷化的通婚圈是与车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承载的是土地与礼俗文化。车寨在榕江侗族村落中，可以说占尽了上风上水之地，与地方政府中心区隔河相望，拥有万亩大坝良田，舟楫交通十分便利，而文化人的不断涌现，使他们的眼界较其他村落侗族更为开阔。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农耕即为大本，是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娶则意味着对外资源的共享，外嫁则会使身份下降，并失去拥有这份资源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来说，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和心理认同感，并与声誉、社会支持等其他的社会资源联系在一起。

当这种同质性较高的生计方式被逐渐打破后，身份的转换成为可能，生存资源的获得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土地，对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的依附渐渐向其他社会关系转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人们还囿于传统的通婚圈，可以说不仅生存资源的获得受到局限，其他社会资源的获得同样受到影响。故而，外扩性通婚圈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就此来说，车寨侗族的通婚圈无论是“内卷化”还是“外扩”，都与理性的生存需求密切相关，结构只是具有暂时的相对稳定性，当构建这种结构的基础被打破时，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文化事象也就失去了依存母体。与此同时，个体理性化的生存需求在改变结构时发挥了能动性作用。传统通婚圈的被打破，生存的土地资源被征用，外面世界各种诱惑的不断侵蚀，使车寨侗族社会文化在当下呈现出躁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 (1) [美] 杜赞奇 (王福明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 1942 年的华北农村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4.
- (2) 唐利平. 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 [J]. 开放时代, 2005 (2).
-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民族志(上册)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 (4) 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榕江县志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5) 杨国仁, 吴定国. 侗族祖先哪里来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 (6) 吴浩, 梁杏云. 侗族款词(上)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
- (7) 盘小梅. 八排瑶妇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A]. 郑玉顺. 女性与社会发展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8) 张民. 榕江县三宝侗族婚姻 [A]. 张民. 侗族探源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2. 331.
- (9) 吴浩. 中国侗族村寨 [M]. “珠郎娘美的故乡——车江寨” [A].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12.

Historical Changes of Intermarriage Circle of Dong Ethnic Group ——A Case Study of Chezhai in Rongjia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YANG Zhu-hu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efore the 1980s, the intermarriage circle of Chezhai was limited in internal circles and dominated by homogamy. Its intermarriage scope was neither the same with market circle nor completely overlapping with sacrificing ritual circle. It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self-sufficient economy such as relative closure and stability. Later on, as a result of the need for rational existence, the original scope of intermarriage selection will be broken.

[Key words] Dong ethnic group; intermarriage partner; selection scope

(责任编辑 李 劼)